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A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Radio and TV Networks*

中国广播电视 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段 鹏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A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Radio and TV Networks*

中国广播电视 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段 鹏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 段鹏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657-0758-2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广播电视—传播媒介—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G229.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292 号

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著 者 段 鹏

责任编辑 李唯梁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758-2/G·0758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1	第一章 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
1	第一节 当前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
15	第二节 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概述
27	第三节 广播电视国际传播
45	第二章 西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国际传播
45	第一节 西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历史与现状
61	第二节 西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宏观经验
74	第三节 西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中观经验
80	第四节 西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微观经验
88	第三章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现状
88	第一节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概要
96	第二节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宏观现状
105	第三节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中观现状
112	第四节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微观现状

129	第四章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129	第一节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中的问题
158	第二节 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原因探析
172	第五章 提升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的策略
172	第一节 提升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宏观策略
183	第二节 提升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的中观策略
201	第三节 提升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微观策略
220	参考书目
221	后 记

第一章 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

2011年1月17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拍摄的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首次亮相纽约时报广场,这不仅是有关我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展现在美国人民面前,也是对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现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与紧密。大众媒介更是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的使命,从经济交往到文化交流、从战争报道到政治博弈,广播电视在塑造一国形象、传递一国文化、扩大一国影响力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过:“媒介即讯息”,在现今信息社会时代,传媒实力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水平,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小。广播电视媒介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主要载体,其国际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好坏,以及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提升国家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成为发展我国“软实力”、树立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保证。

第一节 当前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

一、技术革命带来的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

“媒介即讯息。”今天,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正在不断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成为了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动力,也印证了麦克卢汉的预言。

1. 技术革命对全球文化、秩序的影响

传播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关于文化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曾做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的偏倚性。^①文化的传播同样离不开其媒介载体对时空的控制能力。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传播媒介先后经历了早期的符号媒介、手抄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到今天的网络媒介的发展历程。每一种媒介的发展革新都在不同程度上延伸了人类的传播能力,扩大了文化的影响范围。

20世纪以来,随着广播与电视的飞速发展,广电传媒依靠声像传播信息,感染力极强,使受众的接受兴趣得以增强。与以往的印刷媒介相比,电子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程度的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传播时效性更强,跨越空间传播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也由以往的区域性流动向全球传播转变。不同的文化形式穿越时间与空间而传播,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这些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与环境产生互动,彼此影响,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并改变了文化环境。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卫星通信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标志,拉开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帷幕,也正是新媒体通信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的全球化传播成为每一个文化大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正如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说:“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指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常有争议的结合。”这意味着全球化是文化之间有争议的结合,是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的实质是一场以技术革命为动力所发展起来的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而这场文化全球化的实质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软实力”的较量以及国际传播能力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当前,在科学技术以及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极为不平衡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美国思想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全球化的实质在文化意义上更接近于全球的美国化,正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中指出的:“强大的传播机构要保护的并不是勉强服从,而是通过把美国的形象就代表自由——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和经营自由——的方式在它所渗透的领域获得心悦诚服的忠诚。”^②

① 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② 〔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每一项技术的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思维模式,也深刻影响着文化的传播方式。随着新的媒介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使得以往过于单向的线性传播模式逐渐向传受双方更为互动、交流性更强的传播模式转变,受众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也使得文化在全球化传播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协商,共同构建文本的意义,塑造文化环境;另一方面,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日益扩大,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触角随着发达国家先进的媒介技术延伸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造成了弱势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也加剧了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所谓“依附”是指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扩张不仅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而且导致了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状态,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了一种“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中心部分呈现的发达状态与边缘部分的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密切相关,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边缘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资本积累所限定的一种依附性关系。依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其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并为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依附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流派看来,资本积累依靠的是全球分工,而这种分工的本质是不等价交换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摆脱依附性的地位,按照阿明的说法就是与中心“脱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问题的升温,依附理论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阿明对全球化问题的探究也更加深入,又提出了“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和“全球失序”(global disorder)的概念。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即欧洲、北美和日本具有“五大垄断”——新技术垄断、全球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媒体与传播垄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全球化将不仅使“中心—边缘”的两极格局永久化,而且还将进一步导致“全球失序”而不是“全球秩序”。由此可见,技术革命在带来文化传播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隐忧,全球化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社会的发展,也导致了当前社会的失序。面对全球化的困境,为了在失序的环境中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

2. 网络媒介带来的国际传播环境变化

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依托多媒体技术、数字通信技术等高科技,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今天,在发达国家,互联网已经是无处不

在。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互联网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加以扩散。^①

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络,它与传统媒体相比有更突出的优势:首先,网络媒介有着比传统媒介更大的信息量,正是由于其丰富的信息量,人类社会才彻底由以往的信息匮乏时代转向信息过载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时代传受双方在信息资源占有上极端失衡的状况,使得受众在接收传统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时更具主动性。其次,网络媒介有着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时效性。在过去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受众依赖于大众媒介渠道获取信息,但是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受众能够更为迅速地获取信息,任何信息经由网络上传后即有可能成为全球信息。2010年8月7日的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事故的第一条现场消息就是由一个叫 Kayne 的微博博友发出的,他用图文并茂的微博方式向外界发出了第一时间的救援信号,并对现场情况进行微博直播。更重要的是,随着网络及社会化媒介的兴起,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传播的互动性更趋明显。

作为新兴媒体,网络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多媒体、超链接等特性迅速地改变着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和内容,无论在外在形式还是内在运行机制上,都对媒介传播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网络媒介对传播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网络媒介推动资讯社会的建立

网络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信息流动方式,带来了信息的极大丰富,正是通过网络所构建起来的资讯平台才使得信息跨国界流动变得更加容易。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快捷的信息平台,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② 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体在信息传播渠道中的垄断地位,受众不再被动地接收经过传统大众媒介层层把关过滤之后传播的信息,而是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自己感兴趣的、支持自己观点立场的信息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社交媒介等渠道与他人分享。在国际传播中,网络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到“9·11”恐怖袭击,再到伦敦地铁爆炸案和舟曲特大泥石流事故,网络传播的痕迹无处不在,在抢先报道的时效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向以时效性著称的广播电视媒体在国际传播过程中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使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不得不纷纷做出调整以应对网络媒介在传播领域带来的挑战。早在1995年8月,美国CNN就创立了CNN.com网站,成为美国第一个上网的电视媒体。近年来,CNN不断利用新媒体全面改革

①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田智辉:《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新闻生产流程、改进传播方式、调整竞争策略,最大限度地拓展了用户群,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和显著的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未来电视的话语权。

我国广播电视媒体近年来为了应对网络媒介兴起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也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加强了与网络媒介的合作,促进了传播的多渠道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如CNTV的开办,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国际在线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在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冲击的过程中,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传媒大国。由于受到传统传播模式的束缚,我国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未能及时在网络传播时代有效地转变传播观念,欠缺关于资讯社会以及搭建资讯平台的相关理念,难以应对因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内外传播环境的变化。因此,在网络传播时代,积极发展我国新媒体传媒技术,加强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拓宽传播渠道,搭建资讯平台,发挥融媒优势,是提升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会进一步详细论述。

(2) 社会化媒介给国际传播环境带来的改变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社会化媒介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网络活动,这在互联网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连搜索引擎也只能望尘莫及,自叹不如。^① 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Compete 的最新统计,Facebook 已经超越雅虎成为美国第二大网站,Facebook 2010 年 1 月的独立用户访问量为 1.32 亿。在参与度方面,Facebook 用户拥有超高的参与度,他们平均有 11% 的上网时间花在了 Facebook 上,而雅虎和谷歌这一数据仅为 4%。^②

社会化媒介的出现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模式,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 2009 年的伊朗大选中,伊朗民众利用 Twitter 力挺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据《纽约时报》网络版发表的分析文章称,有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伊朗人在同一时间走向街头,原因就在于他们利用了社会化媒介这个新媒体武器,尤其是 Twitter。借助这些社会化媒介,他们不仅可以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约定在某一时间上街游行,同时还可以号召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访问某家政府网站,利用惊人的流量让网站陷入瘫痪。同样,自 2011 年 3 月起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中,社会化媒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埃及穆巴拉克的倒台,以及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覆灭,在这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我们

① [美]奎尔曼:《颠覆: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② 田智辉:《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 页。

都可以看到社会化媒介的身影,社会化媒介的出现本身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传播环境,尤其是国际传播环境。

首先,社会化媒介的出现使“自媒体”这一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里,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者(Prosumer)，“传播者”与“受众”这样泾渭分明的概念在社会化媒介的传播环境中已经不再适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随身携带的移动终端及时传播信息,这也是为什么 Twitter 以及新浪微博能够有着如此巨大传播力的原因。媒体终端的便携性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事件发生与事件报道的时间间隔,极大地提高了报道的时效性,全球所有受众几乎可以在同一时间获知事件发生的即时信息,事件的发生、传播与接收更具同步性。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自主选择相关信息,而更多在于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控制。这样的特性也使传统的国际传播环境、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对外传播信息方面,内外传播之间的障碍已经打破,任何国内事件都有可能通过网络媒体成为国际事件,国外受众除了从本国官方传统大众媒体获取信息外,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介,如 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等第一时间获取信息。

其次,社会化媒介传播的本质可以归纳为关系传播,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所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只需要通过六步就能够建立起与任何人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化媒介主宰着大半个网络世界的今天,这个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现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众第一信源并不是广播电视媒体,甚至不是 Google 等搜索引擎,而是来自于社会化媒介的关系传播。这一变化使得国际传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活动,也包含国民之间的互动。通过社会化媒介,任何信息都能轻易跨越国界、跨过文化障碍流向对方。可以说,跨文化传播障碍,以及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社会化媒介关系传播的特质所克服。

最后,社会化媒介的诞生使信源更加多样化,且信源可信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提高。因此,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广播电视媒体在对外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强与社会化媒介的合作,拓宽自己的信息传播渠道,另一方面要树立自身的内在公信力。像美国的 CNN、英国的 BBC 等国外广播电视媒体,在社会化媒介的浪潮中,仍然能凭借自身的品牌公信力赢得左右国际舆论的力量。再者,社会化媒介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受众对于信息来源的熟知性,这使得其中人际传播的特性更加显著,也使得传受双方的互动性更好,受众相对更容易采取倾向性解码模式。而在国际环境中,社会化媒介传播更容易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不信任感,能够通过社会化媒介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

的熟悉关系而得到弥补。广播电视媒体与社会化媒介的结合能够更好地拉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成功实现跨文化传播,提升自身品牌与受众的亲密度。

3. 新媒介技术发展给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带来的挑战

众所周知,国际传播由于其自身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因此往往表现在国家政府的直接或间接介入,政府在信息对外传播或接受外来信息并向内传播的过程中都会对信息进行严格的“把关”审查,以确保本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利益不会受损,同时也保障国内信息主权及文化安全不会受到挑战。这一原则不仅针对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著名大众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就曾指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美国的传媒集团与美国政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正如他所说:“与联合国的决议与总统的声明相反,在美国通信卫星公司和美国政府赞助下的空间通信的发展已经支持了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并且厚颜无耻地将自身扮演为一种国际性的事业。”^①国际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软实力”的博弈,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在国际传播的形式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 新媒介技术打破国际传播壁垒,挑战广电媒体的“内外有别”

传统的国际传播有着严格的“把关”,任何事关国家利益的信息都会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查后再进行对外传播。这充分保证了在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环境中,信息流动的内外有别。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介的跨时空传播能力空前提高,互联网的发展拉近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使世界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在这样一个媒介环境中,正如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论述的:一种新的媒体的出现必然打破原有的情境,造成旧有情境的分离与新情境的合并,并创造出新的交往方式。^②网络媒介的发展也必然导致旧有的国际传播壁垒被打破,并创造出新的国际传播形式。网络媒介的诞生,使得传播时效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给以时效性著称的传统广播电视传播媒体带来极大的挑战,在今天的国际事件报道中,第一信源往往不再是广播电视媒体,而是以微博、Twitter等为代表的网络媒体。而网络媒体极强的跨地域传播特性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国际传播“内外有别”的格局,为信息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平台,任何信息上网即成为全球信息。而新媒体所带来的这种信息流动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国际传播平台、打破了

① [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② 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国际传播壁垒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传播控制的难度。

(2) 新媒介技术带来信源多样化,挑战广电媒体的时效与议程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模糊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任何信息的接受者都不仅仅只满足于接受信息,同时还有将信息加工再传播的要求。而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有效地降低了传播者的准入门槛,人人都可通过自己的媒介终端登录微博、Facebook 等进行信息传播,这一过程也就实现了信息来源的多样化。这使国际传播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国外受众获知信息的渠道往往是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信源及传播渠道都几乎为官方所直接或间接掌控,信源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网络媒介的出现,国际传播的信源已不再仅仅限于官方媒体,更多的时候受众的第一信源来自于网络媒介,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信源的多样化使“新闻眼线”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这就使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传统的官方媒体往往滞后于网络媒体,同时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往往也会受到网络议程的影响,这都大大降低了广播电视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使其面临的挑战愈加艰巨。

(3) 新媒介技术带来内容制播平台的开放,促使广电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在传统的国际传播过程中,由于广播电视频道具有稀缺性,因此为了确保广播电视媒体资源的优化利用,国家对广播电视的准入制度进行了严格把控,在制作内容上进行精心筛选。尤其是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广播电视媒体所肩负的政治传播使命使得国际传播的内容制作严格受到国家法律与政策的掌控,例如美国的《国际广播法》就要求平衡和综合地报道美国思想和习俗,反映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国际传播时,美国媒体所制作的传播内容是高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Youtube、优酷等视频网站的兴起,传播内容的制作平台逐渐由官方向民间转移,由垄断封闭转向开放。受众自制的内容不仅可以通过 Youtube 等视频媒介发布,更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传播到海外。正是传播内容制播平台的开放性,带来了广播电视节目的新变化。广播电视节目在制作过程中不但会面对来自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压力,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新媒体及其传播内容所带来的竞争压力。

在当今国际传播环境中,新媒介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日益威胁着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统治地位。如今政府对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

^① 美国《国际广播法》,广播原则第二条, <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HTML/001/003/006/001/47378.htm>。

财政支出不断削减,据报道,美国 VOA 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宣布,从 2011 年 10 月 1 日开始,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而专注在中文数位网路播出。^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美国将加大投入,发挥网络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这使得广播电视媒体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肩负起政治使命,还需要考虑到新媒体的影响,不断丰富传播内容、提高时效性。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也纷纷提出自身与网络媒体合作发展的战略调整,以适应网络传播时代传播形式的变化。新媒体的冲击使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二、信息全球化对国际传播环境的影响

1. 信息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1) 信息社会

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自 20 世纪中叶之后发生了重大的演变,包括社会生产形态、劳动分工、生活方式等,未来学家、研究者和大众媒体普遍将之称为“信息社会的来临”。1982 年,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指出:世界在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他说:“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主的经济社会。”他认为,这个转折点发生在 1956 年至 1957 年,主要标志有二:1956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事务的“白领工人”人数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人数;1957 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辟了全球通信时代,使地球缩小成一个“村庄”。^②

信息社会的发展起源于技术的创新,包括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等在内的新兴科技促使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社会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如奈斯比特所言,在信息社会里,“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提供积极社会生产所需的重要资源。

(2) 信息全球化

1851 年,横跨多佛尔海峡连接英、法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信息在两国间的流

① 《西方改变对华宣传战略 广播战将淡出》,转载自中华新闻网, <http://www.xj.chinanews.com/html/V41/2011/02/24/56102020085.htm>。

② 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8 页。

通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壁垒;1857年,横跨大西洋连接欧美两洲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加快了信息全球化传播的步伐,即信息不再受传统时间与空间距离的限制,任何信息都能够通过电报在转瞬之间传到大洋彼岸,让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在同一时间及时获知。1992年,美国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旨在以因特网为雏形,兴建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使所有美国人方便地共享海量的信息资源。“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提出,改变了人类过去信息匮乏的社会环境,人类从此进入了信息超载时代。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使得“地球村”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人类相互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传播,使人类在思想上、文化上的交流空前紧密。信息传播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产业的日益兴盛,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以超时空的速度飞快流动,使得信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信息全球化的发展还得益于以下因素:传播屏障的消除带来的信息自由流动,传播媒体的跨地区、跨国界经营,传播手段的高度现代化以及各国政府对信息控制的减少。

2. 信息全球化对传播的影响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人们获取的信息量远远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人类真正从信息匮乏的时代转向了信息超载的时代。信息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人们不再苦于信息的获取。在这个传播渠道多元化的时代,任何重要信息都可以通过不同媒介瞬间同步抵达受众。信息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量的增加对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宽,使得信息传播的种类更加丰富。受众不再仅仅满足于被动接受千篇一律的报道,而更倾向于主动选择更为专业化、个性化的信息。随着受众对信息种类要求的不断细化,信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也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传媒大国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信息内容的本地化与细分化,以求实现最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果不是文化的相融与促进,而是全球秩序的失衡。传媒大国凭借自身的传播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扩散到全球,如美国的“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瓦解了弱势国家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也成功地将自身上升为全球的普世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媒大国,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重新构建了中心——边缘的“全球秩序”。

3. 信息全球化所带来的隐患

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促进人类社会发 展方面的确功不可没,同时也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了冲突。但是,相应地,信息全球化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造成了各国政治文化安全的隐患。

(1) 文化帝国主义

信息全球化的本质是文化传播强势国家对文化传播弱势国家的文化侵蚀,信息的全球化传播是以强大的传播媒介技术作为支撑的,任何一个在信息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传媒强国。这些国家打着“信息自由流动”的口号,呼吁信息的流动不应受到任何国家政府的干扰控制。但实际情况是传媒弱势国家根本没有信息传播能力,最终造成了信息传播的单向流动。信息流动的失衡加剧了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文化侵蚀,阻碍了弱势国家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降低了其国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大众传播媒介内容流动的不平衡,侵蚀了文化的自主性,抑制了文化的发展。^①

(2) 文明冲突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断言的那样,随着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也依托这些国家强大的传媒实力向外输出,这必然导致不同文明在断层线上产生摩擦与碰撞,最终造成文明之间的冲突。当前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安与动荡,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伊斯兰文明不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极端弱势,导致其自身内部秩序的混乱,同时也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侵蚀而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对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仇视。

(3) 信息主权纠纷加剧

所谓信息主权,是指一个国家拥有对其自有信息进行开发利用、制定传播制度、保护本国信息资源不受他国侵犯的权力。但是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传播弱势国家在信息主权上不断受到传播大国的侵犯,在逐渐丧失信息主权的过程中,同时也由于信息资源的不对称性,从而加深了本国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正是由于信息的全球化流动,带来了国家对信息“把关”难度的增加,也使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难度加剧。另外,信息全球化使得受众对本土广播电视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依赖程度降低,这不但使本土广播电视的受众大量流失,同时也加

^① 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大了本土广播电视媒体引导国际舆论的难度。当前在信息全球化自由流动过程中,新媒介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下能更好地传播信息,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加强国际传播的能力,广播电视媒体应当调整发展策略,提高与新媒介的合作水平,构建信息安全。

三、国际传播环境变化新动向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当前的国际传播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也给国家形象的构建能力以及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文化安全问题日益显现

当前,虽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但是从新媒介技术如 Facebook、Google、Twitter 等网络媒体的诞生之地都集中在美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技术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由于在“文化工业”领域内容生产的极端不平衡性,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从某个角度说只是为传统的西方传媒大国提供了新的“文化入侵”的渠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新的文化安全问题。随着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信息平台的开放,大量西方文化工业产品通过网络渠道传入发展中国家,侵蚀着它们的民族文化。从这一层面来看,新媒体成为了全球文化“同质化”的技术推手,这也使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的任务更加艰巨。

文化安全问题不但源于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侵略,更源于传播弱势国家对本土文化开发利用能力的有限。从内容层面来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与否除了取决于本国的传播媒介技术手段是否强大外,更重要的是看其能否对自身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大与否,是由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力所决定的,而文化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对本国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外传播能力。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媒体的传播力不断提高,同时也对传播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时代带来的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更带来了文化安全的挑战。传播弱势国家由于对文化内容的开发能力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差距很大,从而导致了自身的文化资源不断受到传媒大国的掠夺。如《功夫熊猫》的拍摄,本来熊猫、功夫是我国特有的文化资